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的初建:1912~1923/汪朝光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1

(中国近代通史;6)

ISBN 7-214-04192-8

I. 民... II. 汪... III. 中国—近代史—研究—1912~1923 IV. K25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 第 131466 号

中国近代通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张海鹏 主编

第六卷 民国的初建(1912—1923)

汪朝光 著

责任编辑 芮从东 金长发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奥能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7.625 插页 4

印 数 1—8 000 册

字 数 50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192-8/K·547

本卷定价 45.00 元(精装)

总 定 价 450.00 元(共十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1
第一节 革命的余波：西式民主的昙花一现	1
第二节 北洋派与革命派的矛盾	20
第三节 二次革命的发动与失败	35
第四节 北洋军阀独掌北京政府	53
第五节 民国初年的对外关系	70
第二章 袁世凯称帝与护国战争	93
第一节 袁世凯帝制自为	93
第二节 革命派与其他派别的反袁斗争	104
第三节 护国战争的爆发及各地响应	117
第四节 袁世凯的末路	129
第三章 军阀纷争与南北对峙	152
第一节 军阀纷争的肇始	152
第二节 督军团干政	163
第三节 清室复辟的闹剧	172
第四节 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	186
第五节 南北对峙与护法运动	209
第六节 护法战争与南北议和	224
第七节 西南地方的军阀割据	245
第四章 五四运动与时代转换之发端	251
第一节 五四运动的思想源流	251

第二节	五四运动的起因	258
第三节	五四运动的发生及演进	267
第四节	五四运动的结局及影响	273
第五节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国际地位的缓慢回升	287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302
第五章	直皖战争	310
第一节	直皖战争之发端	310
第二节	直皖战争的爆发及皖系的失败	320
第三节	直奉共治的北京政府	325
第四节	孙中山回粤再度开府	342
第六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与直系当政	356
第一节	直奉矛盾的激化	356
第二节	第一次直奉战争	368
第三节	黎元洪复职与“法统重光”	376
第四节	直系当政与北京政局	389
第五节	联省自治的思潮与实践	397
第六节	西南各省的局势演变	412
第七章	北京政局的变化	423
第一节	直系当政时期的社会动荡	423
第二节	京汉铁路工潮与二七惨案	432
第三节	黎元洪被逐	444
第四节	曹锟贿选与“法统”中落	453
第五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的北京政局	462
第六节	孙中山北伐受挫及其再起	473
第八章	民初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及其起伏	488
第一节	现代经济法制体系的初步建立	488
第二节	现代工业的较快发展	494
第三节	现代工业发展的起伏	500
第四节	中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	508

第五节 农业经济发展的艰难	513
第六节 财政困难与现代银行业的兴起	522
主要参考文献	531
人名索引	544

第一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中华民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共和时代。民国初年,西方民主思潮与实践一时间颇为盛行,然而通过军事实力和政治权谋而成为北京政府大总统的袁世凯,一心谋求个人专制统治,与寄望于民主政治的革命派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结果导致革命派发动“二次革命”,但因准备不周、实力不济而失败。此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独掌北京政府,逐步废弃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各项民主政制,使民国初年的西式民主实验成为昙花一现。与此同时,民国成立后的中国对外关系,仍因列强之强势压迫而面临着种种困难,在谋求“承认”、对外借款、边疆安全等方面,仍在丧失国家主权和权益,并因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而形成中国外交的危机。

第一节 革命的余波:西式民主的昙花一现

1912年1月1日,作为辛亥革命的高潮与最重要的成果,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从而结束了在中国历数千年的帝制时期,开启了新的共和时代。对此,不仅革命者为之欢欣,广大民众也抱有希冀与憧憬,毕竟革命党人所宣传的“共和”、“民主”、“自由”这样的新名词,较之“皇帝”、“独裁”、“专制”这样的旧字眼,更为动听,更能打动人心。历史似乎为近代中国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历史的演进并不如革命党人设想的那般简单。孙中山在南

京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形成了与北京清政府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而北京清政府的实际权力,此时已落入北洋系军事首领袁世凯的手中,他以军事强人的身份逐渐掌控了情势发展,运用多年从政的纯熟手腕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内以革命党声势逼清廷退位,外借清廷余力压革命党让步,纵横捭阖,极尽权谋,2月12日终于逼清廷退位,15日又被南京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其后,他又以“维持秩序”为借口,以北京兵变施压,推翻了孙中山在推举其出任临时大总统时提出的将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及临时大总统到南京就职等条件,一意将首都设在其势力中心的北京,为建立其个人专制统治预留地步。怀抱革命理想而又缺乏实际从政经验的革命党人及其领袖孙中山,从维持社会稳定、实现政治体制和平过渡的良好愿望出发,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迁就了袁世凯的要求,同意其在北京就职,使袁如愿以偿。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并在其宣誓誓词中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①4月1日,孙中山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南北统一告成。

袁世凯当政之始,虽然出于加强其个人专制统治权力的需要,与革命党人不断发生矛盾冲突,但此时革命的余波仍在各地荡漾,革命党人在中央和地方仍掌有一定的权力,责任内阁制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刚刚实行,在清廷过往严厉的控制骤然崩解之后,舆论开放,思想活跃,革命、共和、民主、自由的思潮四处激荡,各色政治力量亦因时而兴,袁世凯的权力受到各方牵制。在这种较为均衡的政治格局下,一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西式民主景象,其突出表现就是政党林立及政党政治的勃兴。

民国初年的党派数量虽多,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多数党派的具体情况时人并无确切记载,今亦多不可考。据后人研究,民国初年的政治性党派有312个,其中以北京和上海为最多,分别为82个和80

^① 会文堂编辑所:《袁大总统文牍类编》,2页,上海,会文堂书局,1925。

个,而且“几乎所有的西方政党类型都可在中国找到”。在这些党派中,“有些具备政党性质,有些仅系为达成某一种目的压力团体,有些则是社会运动者”,具有健全政纲或具体政纲者不过 35 个。这些党派提出的政纲多数趋同,其中提出最多者为“振兴实业”(13 个党)与“普及教育”(11 个党)。^① 由此可知,民初党派的勃兴是当时特殊环境的产物,其政治基础并不牢固,而且多数也不具有一般而言的政治倾向性,党派的结合更多地是出自利益,而非政见。在这些党派中,组织与纲领比较健全、比较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党派主要是代表革命派的同盟会——国民党和代表前清立宪派、绅商、有产者利益的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及其后由上述三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

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前清时期,同盟会是坚持反清革命的地下秘密团体。民国成立后,同盟会领导人多数认为:今后国内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实行议会民主与政党政治,同盟会应顺应此形势,改组为公开政党,与他党和平竞争。刚刚回国的孙中山虽不赞成此种意见,但同盟会内部主张改组的声浪甚高,1912 年 1 月 20 日,同盟会在南京集议,决定改组为公开政党,并推选汪精卫为总理。但因孙中山不赞成改组,而汪精卫自忖其在同盟会内部的资历、经历与影响力远不能与孙相比,故迟迟不愿就职,改组未能实际进行。直到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同盟会领导层内部才形成今后将主要进行政党竞争之共识,改组之事复又积极进行。3 月 3 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改组会议,宣布改组为政党,选孙中山任总理,黄兴、黎元洪任协理。会议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提出的政纲为:“(1) 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2) 实行种族同化;(3) 采用国家社会政策;(4) 普及义务教育;(5) 主张男女平权;(6) 励行征兵制度;(7) 整理财政,厘定税则;(8) 力谋国际平等;(9) 注重移民垦殖事业。”^②新的同盟会章程虽然以“力谋国际平等”呼应民族主义,以“促进地方自治”呼应民权主义,并明确提出实行民生主义,但其各项政纲多

①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42—46 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② 1912 年 3 月 5 日《民立报》。

为治国的具体方案,并未特别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表现出由革命党意识向执政党意识的转变;其政纲中的“完成行政统一”主张,也说明同盟会当时并无与袁世凯分庭抗礼之意,而希望以和平合法的政治竞争掌握国家权力。但是,当袁世凯掌握中央权力之时,尽管同盟会在由革命党向普通执政党方向演进,却并未能实际消除袁世凯对同盟会的戒心,相反,倒使同盟会自身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袁世凯的警惕。同时,同盟会改组后,为了壮大声势,扩张力量,吸纳了不少官僚政客入会,组织较前庞杂,党务运作不易集中;更兼孙中山和黄兴一度淡漠政治,而黎元洪又非同盟会旧人,入会不过是挂名(同年8月黎因张振武、方维被杀案而被除名),其他人则既乏资历亦乏领导会务之意愿,使得作为一个政党的同盟会在改组之初没有什么起色。直到宋教仁在辞去内阁职务后全力投入会务工作,主持进行二次改组,同盟会的情况才有了较大改观。

1912年4月25日,同盟会总部迁至北京。其后,有同盟会成员参加的内阁与袁世凯发生一系列矛盾,造成同盟会阁员于7月间集体辞职。曾任北京内阁农林总长的宋教仁极具政治抱负,他主张中国应如西方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国家,组成“强大真正之政党”,以两大党轮流角逐内阁首领而使政治进入良性竞争。他认为:“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从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①宋教仁在北京内阁参政的实践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以及来自他党的竞争,都使他感到组成一个大党的必要。因此,他自内阁辞职后即全力投入同盟会的会务工作,7月21日出任总务部主任,积极推动同盟会的再次改组。

宋教仁对同盟会改组的设想并非局限于同盟会自身。为了壮大力量,他还希望合并其他党派,共同组成一个大党。为此,除了在党纲方面作出必要的让步之外,宋教仁甚至不惜主张改变在许多会员心目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同盟会”之名。尽管宋教仁的举措在同盟会内部遇

① 陈旭麓:《宋教仁集》下册,4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到不小的阻力,但经过他的多方工作,终于取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联络他党的合并组党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经过谈判协商,统一共和党(1912年4月在南京成立,谷钟秀、吴景濂等领导)、国民公党(1912年3月在上海成立,岑春煊、温宗尧等领导)、国民共进会(1912年2月在上海成立,伍廷芳、陈锦涛等领导)、共和实进会(1912年2月在北京成立,王宠惠等领导)、全国联合进行会(1912年4月成立,李万铨等领导)先后表示愿意加入,并就合并组党后的党名及各项纲领、政策达成共识。1912年8月25日,由上述党派合并组成的国民党在北京正式成立。

国民党的组成仍以同盟会为主干,是当时革命派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力量。但因其吸纳其他党派及人士加入之需要,对同盟会政纲作了较大的改动,故有“名虽合党,实系新造”的说法。国民党提出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为政纲。^① 如果与前同盟会政纲相比较,国民党政纲的政治意义更为模糊,三民主义精神更趋淡薄,与其他党派的政治立场也在趋同,尤其是将“民生主义”改为“民生政策”,主要是迁就新加入各党之要求,其后受到前同盟会部分激进人士的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但是,主持改组的宋教仁认为,这是同盟会为吸纳其他党派加入而作出的必要让步,主张理想主义应迁就现实政治,以策略让步而获得战略进取。孙中山当时也认为:“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所以反对“挟党见,闹意气”,主张各党派努力同心,共同建国。^② 如国民党舆论之代表《民立报》所言:“国民党必取稳健主义”,即“折衷于事理,不纯趋于感情,以为偏激之进取”“运用于秩序之下,活动于法律之中”“统言之,稳健者,和平进取之代名也”。^③ 就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而言,激进与缓进两种政治主张各有其出发点。缓进的主张其后虽因袁世凯的专制而失败,宋教仁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略》,62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

② 《二十五日之两大会议盛》,见1912年8月26日《民立报》。

③ 1912年9月2日《民立报》。有关革命派在民初的政治主张与活动,可参阅金冲及《民初同盟会人的几种社会政治方案》,载《历史研究》,1991(1)。

甚至为此以身殉政。但在当时,激进主张之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亦为事实。政治的抉择在事后可能得失分明,但在事中之取舍并非易事。无论如何,国民党的成立,立使其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临时参议院的席次过半),也使袁世凯感到沉重的压力,对于革命党人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是有利的,在这方面宋教仁功不可没;其次,国民党基本承绪于同盟会,组织架构和成员骨干也多源于同盟会,同时又对他党有一定的包容性,适应了其自身发展的需要。自国民党成立后,其党名便与民国政治相始终,追根溯源,这与同盟会的改组是有一定关系的。

国民党成立时,选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等 9 人为理事,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虽不反对同盟会改组,并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但他此时对政治表示淡漠,专注于其铁路计划,对党务“一切不问,纯然放任”,国民党党务实际由宋教仁以代理理事长的身份主持。宋教仁以极大的精力和极高的热情投入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尤其是以即将开始的国会选举为目标,奔波于各地,推动地方党务的进行,一时间使得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声势日隆,俨然形成政党政治的格局,使一意建立个人专制的袁世凯感受到威胁和危险,从而也埋下了日后宋教仁遇刺之前因。但是,宋教仁的党务活动过分着眼于选举,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首先是要吸纳更多的党员,而不论其过往的政治立场如何,袁世凯手下的大将、国民党的直接竞争对手赵秉钧亦被拉入党内,甚至还有拉袁世凯入党的呼声,如此新旧合糅、兼容并包的结果,虽使国民党的党员人数及其分布地域有了大幅度增长,但也使得国民党的组织构成日渐庞杂,组织结构日渐松散。各色人等在党内竞相争夺名位,互有歧见的派系互相攻击,使得党内矛盾重重,稍有不合即以离党而去相威胁,使党犹如俱乐部。宋教仁并非出身同盟会真正核心的兴中会系统,其资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为党内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各地方党部自行其是者甚众。如此等等,使国民党在表面的轰轰烈烈之下,与同盟会的革命理想渐行渐远,逐渐成为一切以选举、执政为中心的竞选党。

在同盟会——国民党之外的三大党中,统一党源于中华民国联合

会。1912年1月3日,反清健将、革命宣传家章炳麟(章太炎)联合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等,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分任正、副会长,张謇、熊希龄等成为参议会成员。中华民国联合会“以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为宗旨”政治上,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经济上,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限制田产及遗产继承,强调“富国必先足民,国民经济,应为发展”。比较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章炳麟,还提出了诸如“婚姻制度宜仍旧”、“家族制度宜仍旧”、“庶免文盲参选”、“文字不得用拼音”、严禁“在公共场所效外人接吻、跳舞”等个人主张,在当时到处提倡新事物的浪潮中,显得颇为守旧。清帝退位,袁世凯登台,时局出现新的变化,章炳麟等亦亟思有所作为。3月1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发布通告,宣布改名为统一党,推举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汤寿潜、赵凤昌、蒋尊簋、唐绍仪、汤化龙、温宗尧等为参事。统一党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提出政纲为:(1) 固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2) 完成责任内阁制度;(3) 融合民族,齐一文化;(4) 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5) 整理财政,平均人民负担;(6) 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7) 振兴海陆军备,提倡征兵制度;(8) 普及义务教育,振起专门学术;(9) 速成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10) 励行移民垦殖事业;(11) 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章炳麟将其解释为“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研求至当”。^① 不过,当时章炳麟心目中的“稳健”有更多的含义。章炳麟虽曾为同盟会员,但自参加光复会后,即与同盟会结下了历史积怨。推翻清朝、成立民国,自然成为章炳麟所致力之事业,但其未必愿意见到民国政权掌握在前同盟会、现国民党人的手中。民国成立后,他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隐忧于“党见纷争,混淆黑白,虽稍与立异者犹不可保,况素非其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5—10、14—18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类耶?”^①其“隐忧”何在虽未明言,但明眼人一望可知他对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之不信任。何况统一党成员多为前清官吏和立宪派人士,与革命党人的立场本有分野,故在民初袁世凯和革命派的矛盾斗争中,统一党站在拥袁立场,如主张定都北京,反对同盟会组阁,主张修改《临时约法》等,无不投袁所好,成为袁世凯与革命党人斗争时可以利用的力量。据时人回忆:统一党理事张弧是袁世凯派进来的奸细,党的经济权一直操在张的手中,其经费表面上说是从各方面募捐得来,实际全是袁世凯的钱。由章炳麟与张弧的通信,证此回忆不虚。^②5月9日,统一党加入以黎元洪为领袖的共和党,但因统一党和章炳麟在共和党中的地位不及其所愿,结果加入不及10日,他便在17日通过《统一党独立宣言书》,宣布退出共和党,独立行事。9月2日,袁世凯的手下王赓(揖唐)在北京操纵统一党再次改组,其后又推选袁世凯为名誉理事长,徐世昌、冯国璋、赵秉钧等为名誉理事,统一党由此几被袁收编。

共和党是由5个党派合并组成,即民社(1912年1月在上海成立,黎元洪、孙武等领导)、国民协进会(1912年3月在天津成立,范源濂、黄远庸等领导)、民国公会(1912年1月在上海成立,陈敬第等领导)、国民党(同名异党,1912年2月在上海发起,潘鸿鼎等领导)和统一党,国民共进会的部分成员也参加了共和党。上述诸党派在民初政争中基本上采取了拥袁反孙立场,故有一定的合并基础,其中又以参加了武昌首义的部分军政界人物组成的民社为其中坚力量。1912年5月9日,共和党在上海正式成立,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等为理事(不数日统一党宣布退出)。当月底,共和党总部迁至北京,在临时参议院的席次一跃而仅次于同盟会(国民党),成为与国民党比肩的第二大党。共和党成立时并无特别具体、明晰的政纲,只是提出了较为宽泛的党义:(1)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2)以国家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6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一),400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马勇:《章太炎书信集》,456—45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权力扶持国民进步；^③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行立国。就其强调的“统一”、“国家主义”和“国家权力”而言，无疑对已经手握国家政权的袁世凯有利。实际上，共和党的成立在相当程度上是反同盟会人物的集合，故为袁世凯所乐见，并得到袁的扶持。共和党也对袁世凯投桃报李，在袁党与革命党之争中，持拥袁立场，专与同盟会（国民党）对抗。

民主党由共和建设讨论会（1912年4月在上海成立，汤化龙、孙洪伊等领导）、国民协会（1912年1月在上海成立，张嘉璈、温宗尧等领导）以及国民新政社、共和统一会、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合并组成。1912年9月27日在北京正式成立，选举汤化龙为干事长，提出政纲为：（1）普及政治教育，（2）拥护法律自由，（3）建设强国政府，（4）综核行政改革，（5）调和社会利益。^①组成民主党的中坚力量——共和建设讨论会成员多为前清立宪派人物，奉梁启超为实际领袖，梁亦对民主党的组党活动表示支持，还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时期，即为其起草《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为其组党提供理论解说。梁启超提出：‘民国应以建立“世界的国家”为目标，实行“保育政策”，建立“强有力之政府”，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各项建设，加强中央集权，慎行地方分权。结论是：“人民之对于政府也，宜委任之，不宜掣肘之；宜责成之，不宜猜忌之。必号令能行于全国，然后可责以统筹大局；必政策能自由选择，然后可以评其得失焉；必用人有全权，内部组织成一系统，然后可以观后效也。……故建设强有力之中央政府，实今日时势最大之要求。”^②这样的言论自然为正谋以中央集权为号召削弱以至最终消灭革命党力量的袁世凯所欢迎。10月间，梁启超自日本回国，在北京与袁世凯谋面商谈，虽未获任袁之官职，但袁月赠其生活费3000元。袁世凯的手下亦打入民主党内部活动，其直隶支部由曹锟之弟曹锐负责，以至直隶都督冯国璋特别令巡警道杨以德“转饬厅警随时保护”。

上述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三党基本代表了民初革命派与北洋派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199、203、236—239页。

② 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46页，上海，1912。

之间的中间政治力量,他们的主要组成人员以前清官吏、政客、立宪派、有产者及与革命党持异见的军政界人物为主,以前清立宪派人物为其政治代表,思想倾向较为妥协与保守,立场相近,行动表现稳健,与革命格格不入,与同盟会及革命党人有历史积怨。因此在革命派与北洋派的矛盾斗争中,他们的政治立场更趋向袁世凯而非孙中山。三党的组成及其运作,与民初袁世凯对抗革命党人的政治需要也是分不开的,“乃顺应袁政府组织极大与党之要求而成立,故有御用党之嫌”。^①在袁的刻意拉拢与扶持下,三党成为在政坛上可为袁所用的与革命派对峙的政治力量。1913年初国会选举完成,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袁世凯迫切需要组织能与国民党相较之大党,以在运用武力的同时,在国会内与国民党进行政治争夺,完成选举正式大总统的合法手续。而国民党的胜利也直接刺激了三党的政治竞争意识,他们本与国民党有隙,不乐见国民党在国会坐大,认为唯有合并方可与国民党一争短长。其精神领袖梁启超早就提议组织“健全之大党”,行“公正之党争”,并自1912年10月回国后一直在进行撮合三党合并组党的工作。因为袁世凯和三党互有需要,加以国民党在大选中的胜利,继以“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之争,政治形势的发展有急转直下之势,三党领袖遂达成共识,暂时抛弃无关歧见,互以容忍而求合并之成功。1913年5月29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合并组党大会,正式合并组建新党,并定名为进步党(部分共和党人稍后复行单立门户,仍称“共和党”)。

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汤化龙等为理事,在全国不少地方设有分支部,提出党纲为:(1)取国家广义,建设强善政府;(2)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3)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进步党的成立,与国民党互为政治对手,在某种程度上使国会出现了两党政治形式之端倪。梁启超为进步党起草之宣言亦谓:“政党政治以两大党对峙为原则,必有一党焉,能以独力制多数于国会,然后起而执政,失多数则引退以避贤路,而自立于监督之地位。两

^① 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24页,北京,文化学社,1929。

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①但究其实质,进步党的成立主要仍为袁世凯和前清立宪派联手反对革命派之政治结盟的需要,故其建设“强善政府”的主张,适应了当时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和个人专制的需要,同时其自诩“稳健”,主张“和平”,坚决反对革命派之“暴烈”,也为袁世凯以武力镇压革命派提供了舆论和民意的支持。“二次革命”爆发后,进步党即以“亡我民国”的罪名,要求对革命派讨袁行“正当制裁之法”,并“促令政府迅速戡乱,以保统一”。^②但是,进步党的多数成员毕竟主张实行西式民主与议会、政党政治,与一心追求个人专制统治的袁世凯并非完全一路。当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革命党人的反抗,又利用国会当选为正式大总统之后,进步党也失去了利用价值,很快即为袁世凯所抛弃。进步党中也有不少人在认识到袁世凯专制统治的本来面目后,参加了反袁斗争,成为以后护国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在民国初年出现的众多党派中,中国社会党是比较具有个性色彩的政党。其领袖江亢虎曾经留学日本并周游列国,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辛亥革命前即开始鼓吹社会主义,在上海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在上海召开社会主义研究会特别会议,决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并自任本部部长。中国社会党提出的政纲为:“(1)赞同共和;(2)融化种界;(3)改良法律,尊重个人;(4)破除世袭遗产制度;(5)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6)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7)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8)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除了提出上述较为原则性的政纲外,中国社会党还在其规章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如发行报刊、开演讲会,以推进宣传;组织公共医院、学校,以破除家庭制度;建设社会银行,筹划遗产归公;置备土地,办理农工商商业团,以为党员之实验场。中国社会党对其党员除了要求遵循党纲党章外,还规定可在党的宗旨范围内,组成各种小团体,以个人意志自由行动,并明确规定男女党员

^①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139页。

^②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248—249页。关于民初主要政党的研究,可参阅程为坤《民初共和党的形成、组织及其派系》,载《近代史研究》,1986(3);曾业英:《民国初年的民主体党》,载《历史研究》,1991(5);李育民:《进步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86(2)。

义务、权利平等。中国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主张,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兼容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倾向,以及江亢虎个人的社会主义主张的一个思想混合体”。中国社会党还在民国初年进行了若干社会实践活动,如建立“实行团”,开办育婴堂、幼稚园,创办平民公学,进行地税归公实验,推动工人运动,力争男女平权,推动妇女参政等。^① 这些主张和实践,虽然不乏空想与不切实际的方面,但其试图自社会改良入手改变中国的状况,在民国初年的特定环境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中国社会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主张,使得不少民众经此而知社会主义的名词和实践,在当时吸引了不少具有变革社会理想之人士的关注,并投身其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就曾担任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的干事。中国社会党的主张不见容于袁世凯政府。1912年7月18日和8月23日,北京政府内务部两次发文,指中国社会党之“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人民有保有私有财产之自由之规定相抵触”,“社会主义名称之下,含有种种破坏现社会之主张”,故“为维持国家秩序,应不予以立案”。因此,中国社会党的活动实际并未获得政府的立案核准。1913年“宋案”发生后,中国社会党虽主张以法律解决,但仍为袁世凯所不容。8月6日,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主任干事陈翼龙在被捕后遇害;次日,袁世凯以“犯内乱罪”及“倡乱”为由,下令“严行查禁”中国社会党。^② 江亢虎随后避往美国,中国社会党的活动由此暂停。

民国初年的政党数量虽多,犹如雨后春笋,林立海内,令人眼花缭乱,然其实际大率为利益所驱动,而非主义与信仰的结合。如后来研究者所论,民初政党的特色是:(1)党员跨党较多,(2)党纲不过是空洞的招牌,(3)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③ 此诚为平和之论。细究民

^① 汪佩伟:《江亢虎研究》,79—82、98—106页,武汉出版社,1998;曾业英:《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载《历史研究》,1980(6)。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一),588、593—594、61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③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56—1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初各党之政纲，几难以分别其间之重要差别，满目所见，无非统一、和平、自由、进步等字眼，而且政纲表述日渐虚化，语意含混，解释各异，难以付诸实践。更有许多党派全无政纲可言，只要有人提议，即可结合成党，追名逐利，寡廉鲜耻。正因为组党出自利益而非出自信仰与政见，故各党党员自下而上跨党者甚众，一身而兼数党党员者并不鲜见，“朝进党而暮脱党，暮进党又朝脱党，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数变，恬不为怪，党德政德荡然无存”。^①即便党魁亦如此。在民初政坛甚为活跃的吴景濂，便一身而兼有统一共和党、民社、统一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党等数党党籍，甚至如国民党和共和党这样的对立党，亦有不少互相跨党党员，可见民初之政党自身即无政治定见，其党员也无何政治操守可言。再者，这些党派的成员不少为官僚、政客、闻人及有身家者，缺乏群众基层，不过是政客之间争权夺利的游戏而已。正因为民初党派自政纲政策到组成成分均与普通民众无甚关联，因此民众对这些党派的兴衰命运也淡薄不问。当政治环境变化之后，在袁世凯政府的高压之下，这些党派毫无抵抗的能力，很快星散四方，销声匿迹，其衰之速与其起之勃同样令后人感叹，西式政党政治的民主实验真正成了昙花一现。

与政党勃兴和政党政治相对应，民国初年的政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格局，其中尤以责任内阁制的实行和立法机构的活跃为表征。

1912年4月下旬，南京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实有议员118人。由于各省补选了若干议员，参议员中的立宪派人物有了明显增加，结果，临时参议院议长、革命党人林森被迫辞职出局，临时参议院于5月1日选举前立宪派人物吴景濂、汤化龙分为正、副议长。立宪派议员在北洋派与革命党的斗争中常常站在袁世凯一方，对革命党人不利。虽然如此，同盟会（国民党）仍为临时参议院第一大党，“势力仍大，且党略较优于他党，步武亦较整齐”，^②他们以临时参议院作为约束袁世凯

①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7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②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6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